

交通大學十年憶舊

凌鴻勛原著

編者按：為隆重配合陳樹曦、陳廣沅兩位教授追憶凌鴻勛先生的文章，本誌特摘載凌鴻勛先生原著「交通大學十年憶舊」一文，以供中外讀者參閱，藉此以知一代學人凌鴻勛先生在交大求學、任教、主持校務的經過和貢獻。以下是凌先生的原著：

我在交通大學一共有過三個時期。最初是求學時期，由附中到本科共過了五整年，後來教書先後有三年多，後來擔任校長也有兩年多。一生的寶貴光陰就有十年多是在上海徐家匯渡過的。

交通大學在前清光緒二十二年（一八九六）

創辦的時候，叫做南洋公學，前清末年對外交涉通商，以及新建設事業與教育事業之興辦有兩個重要的中心，在北方以天津為中心，稱為北洋，在南方以上海為中心，稱為南洋。南洋公學是在北洋大學成立以後的一年，由盛宣懷氏奏設創辦的。那時盛氏綜辦全國的路政和電政，南洋公學的經費是指定由滬寧鐵路（即京滬）及上海電報局分擔，所以開辦不久，便設鐵路電機商船等科系。後來清政府設一商部，路電及航政歸商部主管，就把南洋公學也改為商部高等實業學堂。自後由商部而改隸郵傳部與民國成立以後之交通部

，又改名上海工業專門學校。其後改為南洋大學，又改為交通大學。這間學校在抗戰以前一直屬於交通部管轄，自抗戰那年起，才改隸於教育部，為國立大學之一。

學校開辦既較早，又設在江浙人才薈萃的上海，有了好的先天。民國初年起交通大學的畢業生都由交通部分發到各交通機關任用，有時還未等畢業生去服務。學校水準既相當的高，畢業後出路又相當的好，除了分發任用外，每年總有幾個畢業生獲得公費出國留學，因此每年投考上海交大的人就特別多。許多中學畢業生都以報考交大為第一志願。但那時並沒有像今日在臺灣的聯考制度，許多學生考了交大一次不取，隔了一年甚至兩年再來投考。而當時上海及附近幾所公私立的中學，每每拿交大的功課來作配合的標準，使功課和交大的功課銜接，讓畢業生多得考取交大的機會。

但在前清末年，考入交大却不一定怎樣難。

第一、那時風氣還未十分開，對於鐵路電機和商船等科目不像現在的算是熱門，許多學生對這類的應用科學還有點害怕。而且當時學校辦有附中，考入附中雖然很不容易，可是你能够在附中畢

業，你便可以自由選擇一門科系而不必再經入學考試（但後來幾年也要一律考試了），至於各科系的餘額才向外招考新生。如是名額既不多，標準又較高，考進來自然更難些，錄取的又自然是比較優秀的學生。

（一）學生時期

我考進這所學校真可以說得來全不費功夫。我本來生長在廣州，十二歲那年（光緒三十一年）考入了開辦不久的一所廣州府中學堂，這是五年舊制的中學。我父親是前清的一名舉人，做了一生的窮教員，家況是因難極了。所以我十七歲那年在廣州府中學畢業之後，便想找一件工作來幫助家計，真是無心於進取。而且當時廣州所有的較高級學校祇有法政或師範之類，和我格格不入，所以更不作升學的念頭。正在我找工作未成的時候，偶然在報上看到一段小新聞，說上海的工業專門學堂要在廣州招考四十名的官費生，每年由廣東省庫補助學堂經費銀二百兩，學堂裏便免收學生的學膳宿各費。學科則有鐵路、電機、船政等科系，可以選擇。我的幾位同居畢業同學看了這段小新聞都彼此相告，我父親也知道這是一所有名的學堂，監督唐文治先生又是一位德

高望重的人，所辦的都是專門科學，將來找事吃飯是沒有問題的，而且費用除了旅費之外，其餘學膳宿費一概不必要，家中還可以省了一個人的伙食費。因為我家中實在窮得可憐，不得不忍痛多讀幾年書，多學些本領。十七歲便要出來做事，也未免幼稚一點。好在招考就在廣州市，不須跑到上海去，而且祇須花一塊錢的報名費，另繳兩張相片，便可參加，則又何妨去試一下。於是約了同班畢業的同學十幾人，姑且去報名應試，這是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夏天的事。

後來我知道這間學堂招收官費生，並不是單獨向廣東一省試辦，而是向內地好幾省同時進行。因為那時除了北方的北洋大學、山西大學和唐山工業專門（後來也稱交通大學），還有工程專門科系外，長江以南祇有上海這一間學堂得風氣之先。（國內大學最早有土木系畢業生，上海是在一九〇九年，北洋是一九一〇年，唐山及山西是一九一一年，電機系上海第一屆畢業是一九一一年。）其他比較開通的省份，像兩湖、江西、四川、廣東等省，都還沒有一間像樣的工業學堂。各省要辦工業學堂人才與財力都不容易，上海既然有了些基礎，而且每班原有的人數不多，名額尚有，在各省未辦專門工科學堂以前，先送些學生到上海就讀，在各省可以早些養成專門人才。所負擔經費無幾，而學堂則藉各省的補助，於經費上亦不無小補，這是一件很開明的辦法，經過學堂當局請准當時的主管部舉辦的。宣統二年我在中學畢業的那年，恰是第一次向各省考試保送，以後還繼續辦了兩三屆。

現在要談談當時在廣州考試的情形。主持考試的是廣東省提學使，等於現在的省教育廳長。雖然學堂是希望廣東省保送四十名，可是報名投考的人祇有七十幾個。因為投考的資格是要中學畢業，而那時廣東省的中學畢業生還不太多。廣州市內祇有一所府立中學和南海、番禺兩縣立中學，都祇有六、七年的歷史。外縣中學有畢業生者祇不過一、二間。我們在考場還看見有好幾位由香港來的學生，一同應考。這樣的考試場面似乎是很輕鬆的，可是考試的題目看來便緊張了。

題目大約總是由上海學堂寄來的。英文題目裏有一段是翻譯，內容是關於英國史提芬孫氏發明鐵路機車的敘述，由中文翻作英文。現在的中學生也許都聽過這段故事，但是在五十多年前在廣州的中學生對於這個故事真是聞所未聞。何況拿中文來譯成英文，在那時也是很不容易的事。我祇可糊裏糊塗翻了幾句。至於算學及理化，內地中學全是用中文本教授，而出的題目却全用英文。題目尚有點看得懂，但用英文寫答案却就難了。我看了題目已灰了大半的心，既然入了考場，總不想交白卷了事，我現在真想不起我當時卷子上的寫了些什麼東西。至於中文題目，我記得是：「文章根本六經說」。那時內地的中學還相當注重中文，我父親就是一名經學教員，我少時受過幾年的庭訓，雖然還未讀畢六經，却對這個題目拿起筆來洋洋洒洒有條有理的寫了五、六百字。出了考場，和別的同學接談一下，都是說答得一塌糊塗。我們聽見一位香港來的學生還說：「根本不根本暫且勿論，六經是那六經我就不知道清楚。」在我呢，原本不是真有心去應考，既然考得不好那就把這事忘記了。

過了約一個月，報上一段小新聞登載考取的學生姓名。名額雖然有四十，但錄取的祇有六個人，我竟名列第一，第二和第四、第五都是和我在廣州府中學堂同屆畢業的，第三名還是我早一屆畢業的同學。祇有第六名是香港來的一位學生，其餘縣立中學畢業生竟沒有一個被錄取。第六名自然是以英文取勝，第一名大約是以中文見長。因為後來知道我那篇中文得了九十五分。我上面兩次特別說到報上的小新聞，的確是這樣。因為那時社會上對這類事還不大關心，不像現時有公費生考取的消息，報上都鄭重報導，或廣告上有所登載。

我自己看了這段小新聞覺得奇怪極了。本來是姑去一試，並沒有準備升學的希望，而且考得並不好，今考了一個第一，不免有點心動。其他四位同學又都準備要去，而且也都勸我同去，於是結果大家決定同去，我除了拼湊幾件衣服，我母親又給我縫一床棉被外，所有購船票幾塊錢還是借貸得來。

當時我雖然已經十七歲，但從未離開過廣州城一步。這次去上海不但是生平第一次出門，而且在那時看來是出遠門。我父親是一個很細心的人，臨動身時給我許多指示，真是無微不至。因為我不是一個頑鈍的孩子，所以老人家寫給我一首五古詩，後面有幾句說：「莫恃兼人力，矢志駕同儕。」又有幾句說：「阿母念幼子，禦寒無敝裘，但持堅苦心，豈在溫飽求。」

。」給我不少的鼓勵。

那時由廣州去上海祇有水路可走，而最簡便和經濟是坐輪船，招商局的客貨班船，可以在廣州下船，經過香港停一兩天上貨，便直開上海，中間不須換船，因此我們六個人相約購了招商局廣大輪的房艙票，每人銀元八元，船上供飯不供菜，我們經過香港上岸探些親戚，才初次見到汽車、電車等新奇的东西，至於我將來所學的鐵路，這時還未曾看見過。

我們經過六日的行程才到了上海，住入租界洋涇濱一間廣東人開的小客棧。第一件事是要到這間學校去報到。其時我們上海話一句都不懂，還是我幼時我母親用桂林官話教我念書，因此我使用南方官話來應付，鬧過不少的笑話。學校離上海市中心有五公里的路，却有電車可坐，於是同學六人便摸摸索索的向徐家匯進發。那時已經是陰曆九月初了，學校早已開課，恰巧當時南京正開着一個前所未有的南洋勸業會，同時又開一個第一次全國運動會，交大雖然是一所著名的工程學校，可是體育在上海也是有名的，因此學校放了三、四天的假，讓運動員可以去南京參加比賽，而全體同學也可以去南京參觀。所以我們到了學校，祇靜悄悄的見着幾座龐然大廈，找不到幾個人，而監督唐（文治）先生却住在校裏，我們乃手拿公文去謁見監督。唐監督對我們負笈遠來甚是欣慰，說一兩天師生同來便可上課。我們看到這位道貌岸然而又慈祥可親的監督，自然有說不出的景仰。唐監督是江蘇太倉人，前清進士出身，曾經赴歐美各國考察。後來歷任農商

部侍郎（次長），署理尚書（部長），在他任內有許多新事業的建樹。為舊學的新人物。後來因丁母憂，照前清的例就要開缺守制，不能任正缺的官吏，祇可當其他的差使，於是郵傳部就請派了他擔任這間有名學堂的監督。

學校復課了，教務長叫了我們去問話。這位教務長是廣東人胡棟朝先生，美國康南爾大學土木系碩士，回國後考取工科進士，是一位個子短小的學者，他說我們的英文程度太差。因為學校自附中一年級起，所有算學、生物、理化等科學是完全用英文直接教授的，怕我們跟不上。現在既然保送來到，要我們插入附中四年級試讀。我們自己也知道這個道理，既然來到，祇可聽命。因為功課的本身大都已经念過，現在拿英文來再念一遍，自然沒有困難。英文也跟着進步，我記得教我們英文的是一位英國人。他說全班的英文口音以我為最好。後來我和美國人的接觸遠比和英國人來得多，但至今仍有許多人說我的英語口音，是英國的口音，想來和這位英國教師有關。

那時學校管理甚嚴，全體學生都是住校。如果要到上海市區，必須請假。學校有一位監督（等於現在學校的訓導長）陸規亮先生（現在臺灣經營公信工程公司陸君爾恭的父親），管理學生甚為認真，對於新來的附中學生不必說更特別嚴格。我相信我的箱匣和抽屜定必時常給他檢查。我在廣州中學的筆記成績和所繪的地圖等給他發現了，因此就對我注意起來，曾向我詳細盤問過一兩次。第一個學期結束，我就以一個初來而遲到甚久的附中學生列入品學兼優的名單內，由唐

監督用大字的「告示」宣佈出來。這名單當然多數是專科的學生，至於附中學生不過附帶三兩人而已。品學兼優的學生有許多好處。有獎金、有獎書，下學期購買教科書（由學堂整批向國外訂購的）又可以照價打個八折，這都使我這個窮苦學生得到不少的補助。

我進了學校之後，覺得校中功課很認真，同學的水準很高，而且地方離城市較遠，是一個修學的好環境。我且初次體會到學問領域的廣大，和師生人才的衆多，雖然要我多讀一年，但讓我徹底打得有一點，是很值得的。唐監督是一位經學大師，所以學校中對國文也特別注重，除了普通國文功課之外，唐監督也常在星期日自己講一堂國文課，同學可以自由聽講。他老人家還自己編了一部高等國文講義給我們閱讀，又注重讀書的方法，使我們得了不少的啟示。那時校中每年還有一次的國文大會，是全校國文的會考，但同學可自由參加，而不是勉強的。考試成績最好的由監督獎以金牌，次的獎以銀牌或其他書籍獎品等。國文大會總是在孔子誕辰的前十天左右舉行，孔誕日放榜，所有獎品就在祭孔禮節完成後由監督一分發。成績好的文章更印出給同學示範，這很有使同學對中文加以用功的作用。現在一般社會談起交通大學老一輩的學生國文總公認是較好的，自然是那時打下的根基。

唐監督把教務的事和聘請教授等事都交給教務長去辦理。他自己除了注意學生的品德和國學外，還注意於學生的課外活動，這是非常難得的，例如體育、拳術、演講、辯論、音樂等，別的

官立學堂多不注意。但他都極力提倡，並且提倡軍事教育。那時學校裏會由上海製造局（兵工廠）領有步槍二百枝，配有若干子彈，作為平時學生上體操課之用。到了宣統二、三年的時候，因為體操教員魏旭東先生兼任了蘇州商團的教官，商團在蘇州城外有一個靶場，因此唐監督就請魏先生領了一批一批的學生，輪流到蘇州，借用商團的靶場作實彈的練習。我記得宣統三年那年我曾去過兩次，每次實彈三發。在現時學生接受正式軍訓是尋常的事，而交大在清末末年，距今五十多年前，便有這個訓練，不能不說是一件難能可貴之事。說到真槍實彈，我還記得一件很有趣的故事。在上海徐家匯路離我們學校約莫半里的地方，有一座很有名的李公祠，是前清政府為李鴻章會經立功的地方所特准興建的專祠。祠佔地甚廣，祠宇壯麗，花木茂盛。裏面還有一座李鴻章的銅像，穿著黃馬褂，拖上三眼花翎，巍然矗立。不但我們同學得有地利，時常走到祠內瞻仰流連，即上海一般人士也看做一處名勝的地方，足以供人遊覽。到了辛亥那年革命事起，上海光復，我們的同學忽然建議，這所李公祠也應當在光復之列。於是我跟一羣同學便取了步槍，配上子彈，衝入這間李公祠，把牠「佔領」了下來。後來上海軍政府成立，才移交出來。這所李公祠後來便給復旦大學做了校舍。

辛亥武昌首倡革命，未幾各省先後響應，上海社會也有些動盪，上面說過，唐監督是前清進士出身，中年奮跡雲霄，做到一二品大員，對清廷可以說受恩深重。我們學生恐怕他效忠清室，

或會惹出許多麻煩，致對學堂有所影響，為之惴惴不安。乃未幾他和上海的張容、伍廷芳諸公致電清攝政王，勸清室自動退位，改行共和政體，他自己先剪了辮髮，並勸學生一律剪辮，宣佈學校改名為南洋大學。南洋大學的名稱自此開始，監督也改稱做校長。交大自南洋公學時代起，即辦有附屬中學和附屬小學，這原本為打好大學基礎起見。附中和大學同在校區本部，一切管理規章和生活完全相同，惟附屬小學則在校本部之南另闢一個大門，管理上嚴格得多。說起當時小學主任沈叔達先生，上海教育界的人無有不知道，真是專心致志，誨人不倦的一位教育先進。按照當時的學制，由初入小學起，以至大學畢業，共需要十二年。我初入南洋是在附中四年，在學程上還是在當這一段。年紀十七、八歲，也是不大不小。所以對高年級和低年級的同學都很容易混雜得來，獲交了不少的益友。其時入附小及附中的學生多半都是因為學校程度好，管理嚴，名望又著，但入附中的原不一定準備學鐵路或電機這類科學，中學讀完以後，一部份畢業生有因興趣關係改入北京大學和北洋大學法科的，也有因清華開辦有留美的希望而改入清華的，但在南洋歷史上歷盡全部十二年課程的亦大不乏人。後來小學先停辦，改為私立，再又把中學由改預科而至停辦，則情形又不同了。

南洋初時祇辦有鐵路科、電機科和商船科，到了我在附中畢業，鐵路科已改作土木科，範圍較廣。我對於電機科恐怕學不來，對商船科不甚感興趣，對土木科雖然還沒有很深的認識，可是

對於鐵路有過了小小一段淵源，所以我在附中畢業之後，就選了土木科。這一段小小的淵源自然很偶然的。因當我十二歲初考進廣州中學的時候（光緒三十一年，一九〇五），粵漢鐵路早已開始興築，那時是由美國一間合興公司借款修造的。因為華北幾條鐵路都是向英、法、比、德等國借款修造，清政府深怕他們勢力漸大，損我權益。美國是向來對我友善的，因此這條貫通南北的粵漢鐵路幹線改向美國借款，這本來也是一件合理的安排。但未有料到這間合興公司成立不久，會把他的股份逐漸讓給比國和法國的財東，美國人又陸續回國，於是湖廣總督張之洞以法、比兩國在華北的經濟勢力已甚龐大，倘粵漢鐵路也歸這兩國控制，實為不妙，因倡議向合興公司交涉廢約，復改為由我方備款贖路。但廣東方面的人士要求廣東境內這一段交給商辦，由人民來集股辦理。一時風聲所播，社會上馬上活動起來，趕緊為鐵路集股。各學堂的學生也就是集股的對象，約定每一個學生都要入股，每股五元錢，但祇須先交一元。我家裏雖然極窮，但這一塊錢不能不拿出來。於是乎我就做了一元錢粵漢鐵路的起碼股東，從此對於鐵路便發生了興趣。現在學校既有鐵路可學，我便選了土木科。我真想不到這小小淵源後來會給我服務鐵路三十幾年的機會，而且這條粵漢鐵路竟會遲遲進行，有耐心等了三十年之久，等到我後來當了粵漢鐵路的工程局長兼總工程師，才把牠完成了。倘使我當時一塊錢入的股份收據能保留到今天，我想很可以送到博物館去保存。

在上海的學校中，除了南洋之外，還有聖約翰大學也是開辦甚早規模頗備的學校。南洋是官辦，聖約翰是教會所辦。氣味頗為不同。但兩間學校有一樣相同的，是對於體育的注重。那時兩間學校的足球更是有名的。有時你來我往，作友誼的比賽，往往吸引了上海的球迷。而因此贏彼勝，也就成了兩個體育上特別是足球上的對頭。我記得當時南洋的足球有甲、乙兩隊，甲隊的對象是聖約翰和上海的幾隊西人隊，至其他學校要和南洋比賽祇是以乙隊出馬應戰。辛亥革命以後，東南各學校風氣一變，有了華東五大體育會的產生。所謂五大學除南洋外，其餘則為聖約翰大學、滬江大學，與在蘇州的東吳大學，和在南京的金陵大學。這五間大學祇有南洋是官立的，其餘都是教會學校，可見南洋還是風氣開通較早的。我雖然不是一名書獃子的學生，但對於體育一樣都不會參加。因為南洋的體育健將多半是廣東同鄉，他們和我比較熟，又說我的國文好，我就被推了當本校體育會的第一任書記，和出席五大學體育會的學生代表。自後我對於體育也就增加了不少的興趣。華東五大學有體育組織之後，最精彩和最緊張的便是足球錦標的爭奪戰，也就是南洋和聖約翰的爭奪戰，其他的三間大學祇是陪襯熱鬧而已，於大局毫無影響。我記得民國二年第一次錦標賽開始，第一場聖約翰隊到南洋來比賽，南洋以二對一勝了。到了第二場南洋隊到聖約翰比賽，南洋學生去看的頗不少。聖約翰在看台上劃出一區為南洋學生的座位，這原本並無惡意。但南洋學生走進通往球場的路上發現一個

指路牌，寫着「南洋學生從此往北」。南洋學生看了有點不自然，認為聖約翰故意作弄，要南洋從此敗北。而事有湊巧，這一場南洋果然以一對二輸了。這原本也是平常之事，但聖約翰當時組織了所謂啦啦隊，是上海有史以來的頭一次。不但於比賽時啦啦助戰，而且於贏了南洋之後，更大事歡呼，頗使南洋難堪。按照當時五大學比賽的規則，兩隊各勝一次時，須選擇一處中立球場作一次決賽。後來南洋和聖約翰商借京滬鐵路在麥根路的球場作為中立球場，定期決賽。

中立地點決賽的那一天，不但兩校的同學幾乎全體都前往麥根路，即南洋的唐校長和聖約翰的卜肋濟校長都親自到場給同學鼓勵。南洋因為對方有啦啦隊，自己也就組織起來。而且事先準備好，把自己一隊學生軍樂隊高踞了球場旁邊的一座鐵路瞭望台上，不斷在那裏奏起南洋的校歌，和南洋同學聽慣的幾支軍樂，使南洋球員有在自己球場作戰的感覺，而聖約翰學生則反陷於四面楚歌之中。比賽下來，南洋果然得了一次四比一的勝利，奪得了第一次華東五大學足球賽的錦標。自後南洋學生提起麥根路，有點像英國人提起滑鐵盧一樣的驕傲。

上面提到南洋那時的國文大會，我記得我入南洋的第二年，年十八歲，參加了國文會考，得到一塊銀牌。翌年我也參加會考，那次的題目我記得是「原心」。這類性理的題目較考入南洋時的「文章根本六經」似更難着筆。我做完交卷，甚不愜意。結果我竟以一百分列第一名，得到唐校長所發的一塊金牌，和許多其他獎品。唐校

長的評語有「異日可以衛道……」幾句話，我實在覺得慚愧。究竟文學的修養和應用科學的趨向完全不同。我既習了土木工程，而且工程的科目又日漸繁重，我自後不得不收心養性，把平時愛讀的幾本中國書收拾起來，連體育會的書記也辭去，專心我的正經學業。我現在回想一下五十年前我所受的教育，覺得國學的基本修養和身體的鍛鍊都不可偏廢。因為注意中國文學不但使你的筆通暢，便於應用，而且使你對於做人處世的道理打了一個很好的基礎。在應用上可使你能够運用最簡單的文字，最清晰的條理，來表白你的意見，不至於寫下來辭不達意，甚至於事事都要一位操筆的人來起稿。無論你將來做工程師、做律師、做商人，這都是十分要緊的。至於身體的鍛鍊更不必說。我當時雖然不參加任何球類和田徑的練習，可是我的體操成績總是在九十與一百分之間，而且在學生時代養成了一個有規律的生活習慣，可使你老來享受不盡。這兩點我想可供給現代求學青年的參考。

我在南洋求學的五年當中，雖然國體換了，可是校長並未換過，又未起過任何風潮。除了辛亥那一次光復李公祠外，學生未參加政治活動。學校環境安定，多半都是清寒學生，唐校長安貧樂道以身作則的作風深入了每一個學生的腦際，所以全校都充滿敦品勵學的風氣。我在學校五年共十個學期，每學期都得到品學兼優的獎勵。雖然我每年暑假都回廣州渡假，可是除了初入學時遲到外，以後便未嘗請過一小時的假，當時的校風可見一斑。（下期續完）